

新文學家回想錄

今聖嘆著

儒林清話

周作人 馮友蘭 老舍 辜鴻銘 趙元任 潘家洵 冰心 沈從文 梁實秋 李長之 沈從文 梁實秋 李長之 沈從文 梁實秋 李長之

會昭換

胡適哲



今聖嘆回想錄

許定銘

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有一間開在九龍高級住宅區又一村達之路上，叫「文化、生活」的出版社，出版一批以名人掛帥的文學書，記憶中有《黃霑隨筆》、胡金銓的《老舍和他的作品》、今聖嘆的《新文學家回想錄》和董橋的《雙城雜筆》。

寫《新文學家回想錄》（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七七）的今聖嘆，原名程綬楚，卻以字「靖宇」名於香港文壇。他是成長於北平的湖南衡陽人，戰時畢業於西南聯大史學系，為陳衡哲及陳寅恪入室弟子，並甚得胡適器重，曾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一九五〇年移居香港，以教學及寫作為業。胡適逝世後，曾編《胡適博士紀念集刊》（香港獨立論壇社，一九六二）單行本。

近十一萬字的《新文學家回想錄》，收錄人物的雜文三十餘篇，所涉人物周作人、馮友蘭、趙元任、劉文典……等均為民國學術界名人，難得的是今聖嘆過去曾與他們交往過，資料翔實以外，他行文語帶輕鬆幽默，讀之趣味盎然，如《趙元任函授習游錄》、《吳雨僧痴情毛彥文》、《廢名打坐兼打架》、《詩人最多「未亡人」》、《顧樵博學多情》……等，單看題目已知秘聞味甚濃，甚受歡迎。此外，《記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陳衡哲》和記胡適的《不廢江河萬古流》，更因體驗較深，下筆兼及師生情誼，推為本書首選，不可不讀。

我們需要幾個朋友？

馮進



東西走廊

Mark Vernon

是《友誼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Friendship)一書的作者，他反感這樣的數字界定，認為這是把友誼純粹功利化，讓朋友變成了「消費品」。他說得很妙：在超市裡買蘋果，買幾個完全合理，可是這麼算計友誼的「用處」等於是進行一種「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是利用朋友讓自己的生活效益最大化(optimize)。他說，友誼是「我和你」，人與物件之間的關係，我們都希望自己「能對朋友「有用」(useful)，可是一旦感覺自己被「利用」(used)，那友誼就完全告吹了。這兩個「內外」圈子的分別，而友誼一旦純粹功利化，必定「命不長久」。

而且，友誼需要寬容。這不但是說要理解朋友的短處和難處，還要給予彼此足夠的空間。「君子之交淡如水」這句話講得很對。我常常想，纏綿悱惻、要死要活的愛情寫在紙上固然動人，可是實際操作起來，還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幫助的友誼更為可貴，也更為長久。

他的回答是：大約一百五十名。鄧巴是人類學家，他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他認為人腦的尺寸和功能限制了我們能夠記住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有深入的交往，因為友誼需要通過面對面交流來強化。他說的一百五十名「朋友」既包括血緣關係的親屬，也包括在此之外的相識，但不包括那些點頭之交、「混個臉熟」的人，因為他認為友誼需要「信任」和「義務」(trust and obligation)關係的確立。不過，這一百五十個人和個人的關係並不是平等的。鄧巴認為人的交往圈分成四層，最裡層的知心好友一般只有五人，然後是十五、五十、一百五十這樣人數越來越多、親密度越來越低的同心圓。他並且說，這種交往模式不但在人類親猴子和猴子的行為上得到驗證，而且近年來非常流行的社交網絡比方說 Facebook 上，一般人的「好友」也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之間，其中交流最親密的也只有小部分。

以上的一「科學」言論卻受到一位作家的挑戰。馬克佛農(Mark Vernon)是《友誼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Friendship)一書的作者，他反感這樣的數字界定，認為這是把友誼純粹功利化，讓朋友變成了「消費品」。他說得很妙：在超市裡買蘋果，買幾個完全合理，可是這麼算計友誼的「用處」等於是進行一種「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是利用朋友讓自己的生活效益最大化(optimize)。他說，友誼是「我和你」，人與物件之間的關係，我們都希望自己「能對朋友「有用」(useful)，可是一旦感覺自己被「利用」(used)，那友誼就完全告吹了。這兩個「內外」圈子的分別，而友誼一旦純粹功利化，必定「命不長久」。

大公報科學獎主持人秉志

王鵬



往事 劉沉

秉志（一八八六至一九六五年），滿族，我國現代生物學的主要奠基人、動物學家、教育家。一九〇二年他考入河南大學堂，學習英文、經學、數學、歷史、地理等，同時仍努力攻讀古文。

一九〇九年他考取第一屆官費留學生，赴美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是最早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

早年對科學研究的貢獻

一九二〇年秉志回國後，從事生物科學的教學、科研和組織領導工作。一九二一年他在南京高等師範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生物系，並根據國內生物教學的實際，編寫了教材。在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一九二二年他在南京創辦了我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一九二七年創辦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這期間，他往返於寧、京、滬等地，一肩雙挑教學與科研兩副擔子。他為我國生物學界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為有重要貢獻的科學家。同時，他在脊椎動物形態學、神經生理學、動物區系分類學、古生物學等不同領域中進行了大量開拓性的研究，發表近四十篇學術論文，其中相當一部分在學術上有重要創見，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

主持「科學獎金」的評選

一九三六年九月，為紀念天津《大公報》續辦十周年，總經理胡政之和總編輯張季鸞共同商定，以報社的名義頒發「科學獎金」，徵集科學論文，以鼓勵在科學領域的有為之士，尤其是青年科學工作者，推動科學事業的不斷發展。報社特撥出二千元作為獎勵之用。這項「科學獎金」的評選工作，邀請秉志全權負責。一九三六年底，秉志主持的「科學獎金」審查委員會成立，其委員有秉志、嚴濟慈、楊鍾健、曾昭掄、胡先驌、劉咸、孫鍾、胡煥鑄等。經過近五個月的工作，分為八個學科（數學、物理、地質、化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與考古學、氣象學），對收到的科學論文進行了認真的評選。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津滬版《大公報》公布了「科學獎金」的評選結果：數學類為王熙強，其論文題目為《尤拉氏多式根之分布》；化學類為劉福遠，其論文題目為《中國明礬石化學工業之研究》；動物學類為倪達書和苗久棚，倪之論文題目為《角鞭毛蟲屬骨板之形態及腹區骨板之討論》，苗之論文題目為《南京及其附近數種森林昆蟲之研究》；植物學類為梁其瑾，其論文題目為《鹽酸之反

應對於小米種籽發芽率之影響及其水分吸收作用原生質之物理與生理性質及呼吸作用之酵素等之關係》；氣象學類為魏元恆，其論文題目為《中國北部及中部高空氣流與天氣》。數學類本應獎給華羅庚，其論文題目為《華林文題之研究》，因其本年度已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甲種補助金，就不再給華獎金，而改為榮譽入選。原定的物理學、地質學、人類考古學三科，因論文水平不夠而空缺。這次獲得「科學獎金」的都是三十歲以下青年科學工作者，分屬國內各大學或科研機構。

《大公報》「科學獎金」的評選，原擬每年評選一次，後因抗戰而中斷。雖然「科學獎金」只評選一次，但在社會上和科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媒體上宣揚科學精神

昔日的中國，科學技術落後，被人歧視。秉志認為，一方面要身體力行，踐行科學救國的抱負，另一方面要為發展科學技術大聲疾呼。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他為上海《大公報》撰寫了一篇題為《科學與國內之青年》的「星期論文」，闡述了他「科學救國」之道。他寫道：「國人今日自救之術，唯有發展科學。關於立國之所需，倘能利用科學，獨立自辦，而不仰仗於人。國家前途，即減少無限之危險，而吾於此所最屬望以解決此嚴重之問題者，則為國內之青年。數年以來，青年有志之士，目睹國難之急迫，忠義奮發，思得一當以效於國家，其朝氣鼎盛。入世未深，中年人之暮氣、圓滑、取巧、自私等惡習，尚未受其染化。設全國之青年能發憤自責，努力於科學之各門，為救國雪恥之計，其總動力之偉大，誠有不可思議者。故吾國今日之圖存，不能捨科學而旁鶩。而國內之青年，乃擔任此重責之人，願其人人自覺自悟，毅然肩此重責而勿辭也。」他是在號召青年擔此科學大任，走「科學救國」之路。八月九日，他又在上海《大公報》撰寫了題為《科學精神與國家命運》的「星期論文」。

堅持科研不動搖

抗戰時期，秉志因夫人患病，困居上海八年。由於當時他在我國學術界頗有名望，敵偽千方百計尋找他，企圖拉他出來工作。他改名翟際潛，蓄鬚「隱居」，堅決不為日偽政府工作。為避敵偽的耳目，他從中國科學社躲到震旦大學，最後躲到友人經營的中藥廠裡，仍孜孜不倦地堅持做學問，完成論著多種。抗戰勝利後，秉志在南京中央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任教，同時在上海中國科學社做研究工作。

一九四八年他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民黨



工作中的秉志（資料圖片）

政府在去年台灣名單中，也有秉志的名字，並為其準備好了機票，他嚴詞拒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秉志以特別邀請人士的身份，在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參與了新中國的籌建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繼任復旦大學教授至一九五二年。籌建中國科學院時，周恩來總理考慮到秉志在科學界的聲望，曾多次找他談話，希望他出任副院長。秉志再三謙讓，周總理終於接受了他的誠意。中國科學院成立後，他先後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動物研究所研究員，一九五五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秉志開始對鯉魚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鯉魚是我國淡水普通魚類之一，有很大的經濟價值，與人民生活 and 漁業生產有密切關係。同時鯉魚作為一種模式的硬骨魚，是科研和教學的重要材料，在魚類生物學的基礎研究和脊椎動物發生和進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義。然而過去在國內外均無較全面研究的著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秉志訂訂了長期的研究計劃，要對鯉魚的形態學、胚胎學、生理生化、實驗生物學等一一進行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僅完成了形態學的研究，出版了《鯉魚解剖》專著，完成了《鯉魚組織》專著的手稿。

秉志是我國老一輩科學家的優秀代表，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祖國的科學事業，他的業績將永遠留存在我國科技發展史上。

希望與要求



溫家寶總理這幾年已多次「糾正」別人的「用詞」。

最近的一次，是他三下西南旱區考察時，在貴州興仁縣上壩田村。大學生村官崔烈菊在介紹了村裡的生產生活和抗旱救災情況後，對總理說，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水利設施，有水存不住，希望總理幫助解決。總理聞聽後笑着說：「不是『希望』，你應該換個詞，是『要求』！」

這樣的「咬文嚼字」，令人欣然，更讓人深思。

詞典說：希望，是心裡想着達到某種目的或出現某種情況；要求，乃提出具體願望和條件，希望得到滿足或實現。顯而易見，希望者，更多的顯現的是「祈願」，而要求者，則偏重於表達「提出」這一意蘊，打個也許是並不恰當的比方，前者是仰而上，後者是俯而下或者至少是平視。《換詞》之後，人民的主人地位便立刻凸顯。這樣一「糾正」，才擺正了領導與群眾、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因為總理深知，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對他來說，群眾提出的，都是「要求」而非「希望」——前年，在四川震區綿陽一處安置災民的救援帳篷裡，他曾俯身叮囑他的百歲老人陳佳珍誠懇地說「聽您的話，我會努力工作的。」

事實上，對崔烈菊的要求，總理也迅速作出了反應。此次貴州災情考察，總理提出的抓緊編制重點水源地工程近期建設規劃、加快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加強田間節水工程建設和抓好因災受損水利設施修復四項工作，就是對「缺乏水利設施，有水存不住」情況的一一落實。這就是公僕本色。總理這麼多年來夙夜在公、勤勉為民，正是因為他深知自己的角色。

這當然也是政府的職責。所以，總理還會幾次「糾正」「感謝」的用詞。四年前，在重慶一處建築工地的農民工宿舍裡，當工友李開雲說「非常感謝」時，總理當即「糾正」：「不是你感謝，是政府應該做的。」

在連續兩年的兩會期間，當有人大代表對政府工作表示感謝時，總理也都立即「糾正」：「政府應當感謝人大代表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的理解與支持，應該感謝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

原來，頂真地要求幹部幹「希望」為「要求」，正是緣於溫總理銘記着「應該感謝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

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服務人民，需要領導的唯一理由也是服務人民，而要服務好人民，就需要「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的理解與支持」；自然，「要求」政府、「要求」領導，也就順理成章。民有所呼，必有所應，即此之謂。然而，也並不是所有的領導都知道這個道理——或者說，雖然知道，卻並不願意承認和踐行。這種人，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牧民」的思想和高高在上的意識，彷彿權力是祖上傳下來的而不是人民賦予的，動輒「我們政府」、「你們群眾」，更甚者總是想「民可使由之」，稍有政績，更是希望——要求群眾感恩戴德。於是，或是自我逐利，或是獨斷以逞，表現在行動上，要麼頤指氣使，要麼敷衍塞責，要麼麻木不仁。這種人，是將自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由魚水關係變為了油水關係，自己雖然居水之上，然而終於漂浮於水，一遇怒火，還是要被一燒而盡並了無蹤影的。對這種領導幹部，人民也應該送上一本「糾錯本」，讓他們時常「糾」一「糾」頭腦裡的輕民思想以及隨之而來的等級意識。

如果一個政府、一名領導對人民的要求置之不理、置若罔聞，那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法理和道義上的意義。說句大白話，人民供奉、養育你，不是「希望」你恩施服務，而該「要求」你勤勉工作，為民衆的福祉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一個希望人民要求政府的政府才是大有希望的，一個希望人民要求領導的領導才是人民要求的！

「陽光」下的陰影

姚 船



名居 人語

前段時間，一張照片在多倫多廣為流傳。先在互聯網曝光，緊接著又現身報紙，出鏡電視，可謂家喻戶曉。不要誤會，這不是某女星暴露身材的艷照，圖中只是一名穿制服的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仰頭呼嚕大睡。原來是一名公車司機工人在地鐵崗房內值勤時夢周公，任由乘客入關。有人見狀用手机拍下，並上載網絡。

本來，個別人上班時開小差不必大驚小怪。但在不少市民抱怨經濟環境差劣，公車服務每況愈下的情況下，公車車票依然加價，無疑激怒民衆。這張照片於是成了突破口，讓人們的不滿情緒一下子發泄出來。這不，幾天後，網上視頻又揭發，一位公車司機在深夜行車途中，下車入店買咖啡，讓車上乘客苦候七分鐘，回來後發現被人錄影，一怒之下還把乘客都趕下車。

多年以來，多倫多市民對公車司機和員工都十分尊重，認為他們絕大多數勤勤懇懇做好本分工作，熱情為大衆服務。這次風波，恐怕矛頭主要是針對管理層，因為公車局是公營機構，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正如一些政府機關和公營單位一樣，管理鬆散，胡亂花錢，有人甚至利用權權違規貪自己己，引起群眾極大不滿。

安省財政廳每年都會公布一份「陽光名單」(Sunshine List)，把省內去年年薪達十萬加元的高薪公職人員公諸於世，目的是增加透明度。其範圍除省府，還包括市府、醫院、大專院校和中小學等所有公營機構。日前公布的二〇〇九年名單中，共有六萬三千多人年薪超過十萬，佔該範圍內人數百分之五。省府屬下電力公司總裁年薪過二百萬，安省美術館館長也有近百萬。而多倫多公車局有五百多名員工年薪達六位數。其中二十一名像上述照片中出現的售票員那樣的職責，年收入有十二萬五千元，是一般工廠工人工資的幾倍。

不少民衆質疑，這些高薪的公職人員，是否都應該享受如此優厚待遇？納稅人的血汗錢是否被濫用？尤其是在債台高築，庫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政府更要量才而用，合理報酬，每一塊錢都要用得其所。有人更直指政府，公布所謂「陽光名單」只是做門面功夫，因為不管群眾有什麼反應，政府都敷衍了事，從不認真看待，就如近來備受詬病的處理一些公務員補償金一事。緣起安省省府通過法例，從今年七月一日開始，省銷售稅和聯邦貨勞稅合併，統一由聯邦收取，屆時千多名安省有關稅務人員也轉到聯邦機構工作。工時一分鐘不欠，人工更不用說，但省府卻卻要為這些人發放「遣散費」，最多每人四萬多元。納稅人又一次作了冤大頭。難怪人們嘆息，陽光再明亮，仍然處處有陰影。

蠶豆花

蔣愛萍

故鄉有一大片碧綠的蠶豆田。茂盛的蠶豆葉子連成一片，爭先恐後地觸摸著陽光，把泥土遮擋得嚴嚴實實。在種植蠶豆的田埂四周，勤勞的人見縫插針，讓豌豆和蠶豆一起爭搶大地的營養。豌豆花開得正艷，有純白色的，也有粉色的，有的乾脆呈現出絢麗的紫紅，給大片碧綠的蠶豆周圍鑲嵌上了美麗多彩的花邊。定睛一看，那一朵朵脈脈含情的豌豆花，猶如一隻隻美麗的蝴蝶翩躚著雙翅佇立在兩個墨綠色的葉子上。有的已經完全舒展開了翅膀，把美姿張揚地釋放；有的似乎正從蛻殼變成蝶，半夢半醒間正一點點打開嬌柔的翅。白色的豌豆花如同用圓潤光潔的漢白玉雕刻而成，晶瑩剔透，能看見體內的每一根根細血管。定睛一看，會見，就花了眼，似乎是蝴蝶正在翩翩起舞。

春風乍起，蠶豆立刻就精神抖擻起來，它們在風兒的鼓舞下狂吼和沸騰。葉片也乖乖跟隨風



的方向，服服帖帖的與蠶豆桿保持一致。在豆桿上爬得密密麻麻的蠶豆花，以黑白相間的方式，就那樣素雅地呈現在了我的面前。湊近細細一看，蠶豆花的形狀與豌豆花類似，花朵都由一大兩小的三個花瓣組成，從某個角度看似乎是一隻隻展翅欲飛的蝴蝶。蠶豆花內部的兩個嬌小花瓣以相擁的姿態站立，而外部的兩個碩大的花瓣則猶如老鷹抓小雞遊戲裡裡頭的那隻雞媽媽，張開雙臂守護著自己的兒女。內部兩個嬌小花瓣接近花蕊的地方，是純粹的黑色，而外圍則由白色包裹，如小雞那一雙雙澄澈的眼睛，滴溜溜地亂轉。大的那個花瓣背面接近花萼的地方，是淡淡的紫，紫色似乎不甘於躲躲藏藏，但也不敢大張旗鼓地整片渲染，而是以紋路的形式，試探性地延伸著裝點花瓣。

與蠶豆花直視，那種簡單素雅的美，直逼我的心坎，讓我不由自主地震顫。我凝望著它們，它們似乎也凝望著我，頓時，蠶豆花與我內心之間的靈犀在我的周身瀰漫。那一刻，我的內心充滿了無限的柔美和寧靜。一陣素潔的暗香漫潤我的肺腑，我俯身把鼻翼湊近蠶豆花仔細嗅嗅，先前的暗香卻跑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綠葉甘爽宜人的清香。正當我琢磨著先前的暗香從何而來時，又一股暗香微妙而又真切地飄渺著直鑽我的心扉。我終於明白，原來，蠶豆花的暗香，是要用心靈去慢慢觸摸和品味的。如果只是走馬觀花，那就會與其失之交臂。

蠶豆不招搖，不顯擺。雖然與百花爭春，但卻不與百花比艷，而是躲在綠葉的背後，默默地開放。開得安安靜靜、平平淡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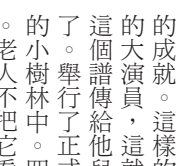
「蠶豆幹嘛要種在油菜旁邊呢？你看，油菜花一開，那麼惹眼，人們一眼就能看見。而蠶豆很矮，花又躲藏在葉子後面。而且，豆田周圍還要種上豌豆，豌豆花又是那麼妖嬈。蠶豆花雖然美麗，但卻很容易被人忽視。」我問母親。

母親笑著說：「蠶豆花的美，最終還不是被你看到了。」

我願以蠶豆花的稟賦，浸潤自己的靈魂。

京劇與史筆

徐城北



文化 經緯

好京劇中一定是有史筆的。老戲《捉放曹》中的曹操，曾惡狠狠地向陳宮宣明：「寧教我負天下人，也不讓天下人負我！」這性格多麼鮮明。而新時期中的《曹操與楊修》，老生演員先後更換過三次，而三次都採用了不同的流派，這就更加鮮明地反映出曹操的多面性格，其中史筆就集中體現了軍政統帥與帳下幕僚的矛盾之處。記得一開始，觀眾開始討論再怎麼修改也不該殺他；以後深入討論，覺得楊修過分堅持己見，讓曹操不能不殺他；再往後，此劇給人的感覺就是過分的楊修不合時宜，殺楊修的根本原因則在他自己。《曹操與楊修》演了二十多年，其史筆一直沒有定論。我會當面問過尚長榮，哪個曹操演得更好，或者與自己的合作最默契？長榮思考了很久，也沒正面回答。這也難怪，三位老生都很傑出，都在塑造人物上下了很大心思，自己是不應該沒有「類言亂語」的。的確，整個社會一直向前發展，現實生活中也有類似矛盾。恰是它，激發了京劇對觀衆的現實思考。

其實，不只是嚴肅的大問題才需要慎重著墨，其實很小的事情也包含着大意義。京劇曾有一位小生宋素雲，他比梅蘭芳大幾歲，也曾同台合作過。他有過這樣一件真實的逸聞：有朋友為他提親，女方很漂亮，但家裡有位尊母，是位盲人；相親時同時去了兩位男性，說「一位也是演員，唱花臉。相親時老太太出來了，說「他依次摸過兩位了，讓我摸摸你們吧」。於是，他依次摸過兩位「進女婿」的手，最後又摸了他的臉。最後老太太就選中了宋素雲。什麼理由呢？從老太太太這樣，發現宋的皮膚相對細膩，覺得宋應該是個性格溫柔的人，女兒嫁給他不會吃虧。這件事很小，估計小生的敬業，一直要落實到愛護皮膚，這是職業習慣，也會落實到未來的家庭生活當中。這很耐人琢磨，這不算京劇的又一種史筆吧？

往近代說，一位輔佐過譚鑫培的武花臉錢金福總結出一種京劇人物的動作作譜，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這樣的成就出自武花臉，而非主要行當的大演員，這就耐人思忖；等到他年老，準備行當這個譜傳給他兒子錢寶森時，奇怪的事情又發生了。舉行了正式的傳接儀式，地點設在一個臨窗的小樹林內。四周還讓主人把守著，閒人不許靠近。老人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私利，而是整個梨園的公器。這就非常了不起，在瀟灑著的宗教氣氛中，真正突出了的乃是一種神聖的史筆氣概。

又譬如梨園的傳承。余叔巖一輩子收了兩個徒弟，女的孟小冬，男的李少春。從微觀講，孟學得更資貴，但李少春後來轉益多師，幾乎獨成一派。他倆到底誰對京劇的發展貢獻更大？這雖然難只涉及兩個人，但討論起來是不容易得結論的。因為余叔巖開創自己聲譽的實踐中，是運用了史筆的。因為關於史筆的例證很多，但真要說清楚並不容易。往往說着很好玩，但一深究起來，就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三了。它經常萌生在認識的知性階段，今人往往太沉醉並追求理性的衝動之中，所以至今對史筆還解釋不多。最近，又傳說明年年行的衝動之中，申請，如果屬實的話，其中的或大或小的史筆，也很值得我們事先弄清楚。否則等到大項目拿了下來，連其中哪些屬於史筆我們還把握不住的話，那就有些尷尬了。